

一

# 初見朝陽

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集團被粉碎，這標誌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結束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開始。這時國人面臨着兩個重大的任務：一是揭開舊路線和舊體制的「革命」華袍，還它們的本來面目；二是找到體制革新的正確方向，以之作為指針來營建新體制。

我和理論界的一些同仁積極參與了這兩個方面的工作，收入本部分的文章，反映了我在這個時期的主要思想。

中國經濟學界對極左經濟理論的系統批判，是從批判「四人幫」上海寫作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始的，而我對這種經濟理論的批判，則是從清理自己20世紀60年代曾經接受和宣揚過的同類思想開始的。我在1978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發起召開的經濟學界批判上海寫作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會議上所做的〈關於社會主義「兩重性」問題的再探討〉（1978年3月）發言，既是對極「左」理論的批判，也反映了對自己60年代錯誤認識的反思。

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揭批「四人幫」的時候，中國思想界對於極「左」理論的實質何在，存在好些不同的說法。我根據自己與顧準<sup>1</sup>的討論和後來去昔陽和大寨<sup>2</sup>等地的調研，痛切地感到中國社會膏肓之疾在於數千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影響已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我寫了一系列文章，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極「左」路線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參見收入本書的〈論「四人幫」經濟思想的

1 編按：顧準（1915-1974），中國當代傑出的思想家，經濟學家。他在青年時代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解放初期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兼上海市財政局局長、稅務局局長。1957年以「反蘇」的罪名、1964年以「反毛」的罪名兩次被劃為「右派分子」。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時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由自發漲落的市場價格調節的觀點，因而成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人。他在「文化大革命」苦難中寫成的《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中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以及對近代世界兩種思想潮流和社會制度的分析，對改革時期的社會思潮產生了重大影響。

2 編按：昔陽縣，位於中國山西省北部。20世紀60年代因毛澤東號召全國向昔陽縣所屬的大寨大隊學習而出名。

封建性〉（1978年7月）、〈批判林彪、「四人幫」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1979年3月）和〈科學社會主義同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鬥爭〉（1981年3月）等文）。

至於講到中國應當建立什麼樣的新體制，我的思想就不是那樣清晰了。當時大家從對外國經濟的觀察中得到的共識，是市場經濟具有巨大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引入市場機制。然而由於缺乏現代經濟學知識，我們大多數人並不了解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同時還保留着傳統政治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種種偏見。因此，我們就很容易接受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主張，也就是在保持計劃經濟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條件地引入市場的作用，擴大國有企業的自主權和加強市場價格信號對企業決策的影響。收入本書的〈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企業的自動調節〉（1979年1月）和〈關於中國現階段生產關係的基本結構〉（1982年10月）兩文都表現出這種特點。

對我來說，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在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得到消除。從收入本書的〈從匈牙利經驗看中國當前的改革〉（1985年8-9月）一文也可以看到，我在提高經濟學素養和汲取蘇東國家經驗基礎上超越市場社會主義和形成整體改革思想的演變歷程。

# 1 關於社會主義「兩重性」問題的再探討

1978年3月

「四人幫」上海寫作組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sup>1</sup>是以所謂社會主義「兩重性」：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和衰亡着的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作為中心線索的。通過這一中心線索的展開，它把社會主義等同於資本主義，並且得出必須對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廣大群眾和幹部實行「全面專政」的政治結論。這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序言中明確概述了它的中心思想：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一分為二，既有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現為資產階級法權的資本主義傳統和痕跡。……這種矛盾運動，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特別是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和執政的共產黨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無產階級要最終消滅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差別，必須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顯然，這個以所謂「兩重性」為中心線索構築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是極端荒謬和極端反動的，這就使我們有必要對它的理論出發點，即所謂社會主義「兩重性」學說作認真的考察。

---

\* 這是本書作者1978年3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召開的批判「四人幫」在上海組織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會議上的發言要點，收錄於吳敬璉：《吳敬璉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頁。

1 這本書的編寫，自始至終是在「四人幫」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前後寫了五稿，並多次修改。五個版本分別是：(1) 1972年討論稿，未正式出版；(2) 1972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 197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4) 1975年未定稿第二版，以「內部資料」名義大量發行；(5) 1976年未定稿第二版討論稿，未正式出版。

「四人幫」的「兩重性」理論是極端荒謬和反動的東西，但在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中，這種理論卻並不是由「四人幫」首先提出來的。早在 60 年代初期，中國一些經濟學工作者（包括我本人）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兩重性」，既有共產主義因素，又有舊社會的痕跡的觀點，後來經濟學界相當多的同志接受了這種觀點。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性質所作的這種估計，在國外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認為是「中國的新論點」<sup>2</sup>。

60 年代的「兩重性」觀點和「四人幫」的「兩重性」觀點是有區別的。例如，60 年代的觀點強調了社會主義是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因素在社會主義社會居於主導地位；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私有制殘餘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的舊社會痕跡，通常是區分開的；等等。然而，那以後的實踐，特別是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鬥爭說明，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有很大的缺陷，特別容易為假「左」真右的修正主義者所利用。因此，我們應當本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對這個問題作認真的再探討。

社會主義社會「兩重性」的說法，是針對蘇聯經濟學界的傳統說法提出來的。1934 年 1 月，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聯共十七大上宣佈，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基礎。那時以後，蘇聯經濟學界佔統治地位的觀點是：過渡時期的任務既已實現，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革命就不再必要，任務只是在既定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兩種公有制、按勞分配等）下發展生產力，直到具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物質前提。他們忽略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列寧（Vladimir Lenin）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包括它的生產關係）是「不斷改變」和「不斷進步」的這個重要論斷，否認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關係將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有步驟地變化。1958 年以後，中國理論界針對蘇聯經濟學界的傳統說法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和當時對過渡到共產主義想得很輕易（例如三、五年或十來年就可以實現這一過渡）的估計相聯繫，我

2 參見【日】副島種典（196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年，第 24-29 頁。

們的有些論述在強調不斷革命的同時忽略了革命發展的階段性，結果使自己陷入了片面性。

在上述背景下，形成了社會主義「過渡性」和「兩重性」的理論。

早在 1958 年冬，在湖北省委理論刊物《七一》等報刊上，進行了「我國建成社會主義之日是否就是進入共產主義之時」的討論，其中一些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存在「公」與「私」的矛盾，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就是破私立公的過程，而建成社會主義之日，也就是「私」字消滅、進入共產主義之時。這種觀點，是「過渡性」、「兩重性」理論的先導。1960 年初由理論宣傳的領導部門起草的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宣傳提綱》中，把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當作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任務。為了論證這個任務，《提綱》列舉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方面」，其中既包括定息這類資本主義的殘餘，自留地這類小私有制的殘餘，也包括集體所有制所帶有的個體所有制痕跡，還包括按勞分配的「半資產階級法權」。由於把以上幾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經濟關係劃作一類，而同共產主義的因素相對立，「兩重性」的理論也就初步成型了。在 1960 年 3 月到 5 月召開的全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討論會上，「過渡性」、「兩重性」的觀點佔了優勢。我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sup>3</sup>一文是全面表達這種觀點的一個嘗試，後來不少同志發表過論述這種觀點的文章。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問題，60 年代的觀點認為，不能說社會主義公有制一朝建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就已結束。我現在仍認為，這一看法是正確的。

3 吳璉（1960）：〈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載《經濟研究》，1960 年第 5 期。1960 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中央黨校召集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參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的骨幹人員學習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批註和談話的研討班。會議首先由陪同毛澤東讀書的《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鄧力群詳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註和談話，然後分組學習討論（鄧所傳達的內容參見鄧力群：《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 年）。這篇文章根據本書作者在這次研討班上的學習體會整理而成，用「吳璉」的筆名發表。

但是，60年代的觀點混淆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不同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說二者都處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不確切的。因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實現，表明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已經達到，就是說，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的大門，正在登堂入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完全應當說，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已經基本實現了。如果到那時還需要強調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仍然殘留舊社會的痕跡，過渡的任務還沒有完全、徹底地實現，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畢竟是過渡時期遺留的任務，決不能因此把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消除這種痕跡的努力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為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所作的努力等量齊觀。60年代的理論特別容易造成混亂的（我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一文也許是第一個這樣做的）是：用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中很明顯是論述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的一段話（「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着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和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sup>4</sup>）來證明，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具有「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徵」。「四人幫」利用這種說法大作文章，可見科學上的不嚴謹危害有多大。

30年代初期以後，蘇聯的經濟學者在強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優越性（這是完全正確的）的同時，抹煞了它還「保留着舊社會的痕跡」的事實，這是有片面性的。社會主義是不完全的共產主義，它的「不完全」之處在於「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在這個意義上，是可以說社會主義既有佔主導地位的共產主義，又有佔從屬地位的舊社會的痕跡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範疇都可以「分解」為共產主義因素和舊社會的痕跡，這樣一種方法論原則是否站得住腳，也是可以討論的。問

4 列寧（1919）：〈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見《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頁。

題在於，60年代的理論混淆了社會主義社會中舊的經濟成分的殘餘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的「舊社會的痕跡」這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事物。我們雖然有時把社會主義社會中遺留的舊社會的經濟成分、因素和舊社會的痕跡區分開來敘述，但在不少的場合，又對它們等量齊觀，稱之為「舊質要素」、「舊社會的殘跡」、「私的因素」，甚至稱之為「舊社會的因素」，這顯然是錯誤的。因此，雖然有的文章還指出過，決不能說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是資本主義留下來的東西，可是，由於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的舊痕跡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舊經濟的殘餘混為一談，把它們都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徵」，這就給「四人幫」污蔑社會主義，把按勞分配說成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留下了很大的空子。現在看來，把社會主義各個階段上的舊殘餘和舊痕跡合在一起稱為「衰亡着的舊質要素」的說法極不確切，應當拋棄。

從政治上看，60年代的理論混淆了社會主義的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有很大的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在當時有利於陳伯達、張春橋刮起的「共產風」，後來更為「四人幫」用來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根據這些歷史經驗，這種片面性必須堅決糾正。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似乎可以分為三個性質不同的階段：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從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發達的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在每個階段，革命的任務不同，各種生產關係的意義也不同。例如在60年代初期，中國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剛才取得基本勝利，剛剛建立起來的公共所有和按勞分配制度，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種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包括所謂「資產階級權利」的殘餘在內，是適應生產力的狀況的，具有極大的優越性，說取消它們的任務已經提到日程上來，顯然是錯誤的。列寧在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著作〈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中指出：共產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發展



起來」，「社會主義只有完全取得勝利以後，才會生長出共產主義」<sup>5</sup>。但在 60 年代，我們卻認為不能提「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似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落後，需要很快用共產主義代替它了。有的文獻還在上述經濟分析的基礎上，做出了以下的階級鬥爭形勢的估量：在中國，存在着三種不同態度的社會勢力。第一種是促進派，他們堅決主張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以便儘快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二種是反動派，他們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第三種是保守派，他們主張永遠停留在社會主義階段上，他們滿足於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存的現狀，滿足於「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制度，不願意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他們動搖於前兩種人之間，如果不前進到促進派的立場上來，就有被反動派俘虜的危險。在這三種人之間，存在着尖銳的鬥爭。這個鬥爭實質上是前進到共產主義、或者倒退到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前已指出，60 年代觀點中的片面性錯誤，對於廣大理論工作者來說，是從急於過渡的良好願望產生的，然而這類錯誤說法卻很容易地為林彪、「四人幫」一類打着「最革命」旗號的極右派所利用了。他們為了論證自己「全面專政」的法西斯政治綱領，就要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擴大化，落腳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中，於是他們抓住 60 年代觀點的片面性，充分加以發揮，構築起一個假革命的理論體系，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指向擁護社會主義的幹部和群眾，來為他們篡黨復辟的陰謀服務。

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性質，怎樣分析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同右的和假「左」真右的修正主義者之間有着重大爭論的問題。我們應當根據中國和外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根據建國以來我黨歷次重大路線鬥爭的經驗，進行認真的研究，做出切合於社會主義實際的結論。

5 列寧（1919）：〈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見《列寧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41、143 頁。

## 2 論「四人幫」經濟思想的封建性（節錄）

1978年7月

在「四人幫」猖狂活動的十餘年間，他們操着「最最最革命」的語言，提出種種蠱惑性的「社會主義」理論，一時間對於不明真相的人們頗有些迷惑力。為了徹底消除「四人幫」製造的幻覺、剝掉他們的「革命」偽裝，還其反革命本相，就要認真地研究他們的言論和聲明，弄清楚在漂亮的言詞後邊蔭蔽着哪個階級的利益。

### 一、「四人幫」為什麼反對發展社會生產力？

反對發展社會生產力、反對採用現代技術、鼓吹蒙昧主義和愚民政策，是「四人幫」所謂「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大特點。他們把主張發展生產污蔑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把實現四個現代化污蔑為「修正主義的口號」，經常宣揚「只要路線正確，不出煤也要開慶功大會」、「顆粒無收也沒關係」、「即使全國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勝利」一類謬論。

「四人幫」這種觀點的反社會主義性質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來說，能否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對於像中國這樣在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裏取得革命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提高勞

---

\* 本文摘自本書作者和周叔蓮合寫的〈「四人幫」——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招魂巫師〉（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7期，該文根據周叔蓮與本書作者在1978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批判『四人幫』兩個估計座談會」上題為〈「四人幫」宣揚的是誰家的社會主義〉的聯合發言整理而成）一文。又見吳敬璉：《吳敬璉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87頁。